殖民统治与学术建构之互动

——以英国在非洲的殖民统治为例*

李安山

内容提要 本文以英国在非洲的殖民统治为例，聚焦学校、学科与话语三个维度，系统剖析殖民权力与学术建构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学校层面，殖民政府通过建立教育体系培养服务于其统治的本地精英，以实用性与文化同化为导向，强化殖民意识形态渗透。学科建构方面，以英国人类学为核心，揭示该学科如何通过田野调查与理论生产为间接统治提供知识工具。话语维度则批判殖民者对非洲历史、文化及文明的系统性建构，剖析其背后的种族主义与西方中心主义逻辑。文章指出，学校建设、学科及话语权建构与殖民利益息息相关，殖民统治通过学术机制将非洲“他者化”，既塑造了服务于帝国利益的学科体系，又消解了非洲本土文化的主体性。后殖民时代的非洲不仅需要巩固政治主权，还需要维护文化主权，包括重构学术话语、解构殖民遗产，并通过非洲学者自主研究实现历史与文明的非殖民化。

关键词 殖民统治 学术建构 西方中心主义 文化主权 非殖民化

作者简介 李安山，北京大学教授，多伦多大学历史学博士，中国非洲史研究会名誉会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IX—XI）国际科学委员会副主席，摩洛哥皇家学院外籍院士（北京，100871）。

2005年7月举行的八国集团峰会将消除非洲贫困议题列在议事日程首位。时任英国财政大臣、后任首相的戈登·布朗在向非洲人阐释他大力推进的援助计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跨文化哲学视野下的非洲哲学研究与译介”（20&ZD036）的阶段性成果。刚果（金）博马大学的龙刚博士（Antoire Lokongo）和暨南大学博士生王颖帮助查资料，在此一并致谢。

划时说：“我们将帮助你们获得开展贸易的能力，这不仅是打开一扇门，更是让你们获得跨进大门的能力。”^① 这种表态充分显示了布朗对非洲经济史的无知。非洲人的贸易活动早于英国诞生，穿越撒哈拉沙漠的贸易商道早已存在。布朗对英国与尼日利亚之间的贸易史同样无知。在英国占领尼日利亚前，尼日尔河河口的贾贾国王不仅控制了当地棕榈油贸易，而且将自己的商船绕开企图充当中介的英国人，直接将货物运往英国。为了消灭这位强大的竞争者，英国人不得不用阴谋将他骗到船上后送到黄金海岸囚禁。^② 布朗的这种无知实则源于殖民统治时期形成的错误的非洲文明史观。

在欧洲扩张时期，殖民权力与知识话语的交流与交换一直进行。这种看似正常的过程在 20 世纪 60 年代遭遇挑战，学界开始对殖民主义与学术之间的关系进行批判。^③ 1968 年“人类学还活着吗”的惊人之间指出人类学的伦理立场，或视人类学为帝国主义的工具，或从理论上分析人类学的缺陷。^④ 文学批评家萨义德通过西方对东方形象的建构探究文化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地理学家布

- ① [美] 威廉·伊斯特利：《白人的负担——为什么西方的援助收效甚微》，崔新钰译，中信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2 页。
- ② S. J. S. Cookey, *King Jaja of the Niger Delta: His Life and Times, 1821 - 1891*, New York: Nok, 1974; 李安山：《非洲现代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379—384 页。
- ③ P. C. Onwuachi and A. W. Wolfe, “The Place of Anthropology in the Future of Africa”, *Human Organisation*, Vol. 25, No. 2, 1966; Claude Lévi-Strauss, “Anthropology: Its Achievements and Future,”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 7, No. 2, 1966; K. Gough, “New Proposals for Anthropologists,”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 9, No. 5, 1968; S. Clarke, “A Technocratic Imperial State? The Colonial Office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1940 - 1960,” *Twentieth Century British History*, Vol. 18, No. 4, 2007; G. B. Masfield, *A History of the Colonial Agricultural Servi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2; P. Gummatt, *Scientists in Whitehall*,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0; R. Drayton, *Nature's Government: Science, Imperial Britain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Worl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H. Tilley, *Africa as a Living Laboratory: Empire, Development and the Problem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1870 - 1950*,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 Sabine Clarke, *Science at the End of the Empire: Exper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ritish Caribbean, 1942 - 60*,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18.
- ④ G. D. Berreman, “Is Anthropology Aliv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Anthropology,”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 9, No. 5, 1968; K. Gough, “Anthropology and Imperialism,” *Monthly Review*, Vol. 19, No. 11, 1968; D. Goddard, “Limits of British anthropology,” *New Left Review*, Vol. 58, No. 1, 1969; Bob Scholte, “Critical Anthropology since Its Reinvention,” Joel S. Kahn and Joseph R. Llobera, *The Anthropology of Pre - Capitalist Societies*, Macmillan, 1981, pp. 148 - 184. 中国学者关于人类学与殖民主义之关系的研究，参见景军：《人类学思想的他者建树》，载景军、高良敏主编：《南部理论：人文社科思想的他者建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4 年版，第 191—212 页；徐薇：《南部非洲人类学研究综述》，《国外社会科学》2013 年第 3 期；徐薇：《人类学的非洲研究：历史、现状与反思》，《民族研究》2016 年第 2 期；刘大先：《中国人类学话语与“他者”的历史演变》，载刘禾主编：《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 年版，第 469—515 页。

劳特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分析地理传播主义与欧洲中心史观之关联。^① 姆丁贝在从哲学角度分析欧洲学界对非洲的认知时指出：“文化上的我族中心主义解释了社会科学学科历史和实践中的意识形态变化和斗争。”^② 南非人类学家玛费杰对流行的“部落”概念进行溯源，认为非洲本土语言中并无该词，殖民政府在人类学家协助下创造这类词以形成有利于殖民统治的话语。^③ 马古巴尼认为人类学通过“西方化”或“现代化”概念试图消除非洲本土的独立性。^④ 本文力图从历史角度分析殖民统治与学术建构之间的互动，集中在学校建设、学科建构及话语建构三个方面。对殖民主义与学科建构互动的研究集中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的英国人类学，主要原因有二：英国人类学的影响至深且远；^⑤ 这一学科与非洲研究的关系密切。^⑥

“帝国的堡垒”：殖民统治时期的学校

重商主义解释了资本主义早期发展的基本需求，殖民地的作用是为宗主国提供物质、市场和劳动力。^⑦ 欧洲征服殖民地需要理由来使自己的行为合理化并说服他人，有关“野蛮人”（savages）的解释开始在欧洲启蒙学家中出现。这些物

-
- ① [美] 爱德华·W. 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年版；[美] 爱德华·W. 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年版；[美] J. M. 布劳特：《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传播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史观》，谭荣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
- ② V. Y. Mudimbe, *The Invention of Africa: Gnosis, Philosophy, and the Order of Knowledge*,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19; William Graham Sumner, *Folkways: A Study of the Sociological Importance of Usages, Manners, Customs, Mores, and Morals*, Boston: Ginn and Co., 1906.
- ③ A. Mafeje, "The Ideology of Tribalism,"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 9, No. 2, 1971. 有关玛费杰的研究，参见熊星翰：《对南非人类学家玛费杰部落主义批判的解读与反思》，载景军、高良敏主编：《南部理论：人文社科思想的他者建树》，第 257—281 页。
- ④ B. Magubane, "A Critical Look at Indices Used in the Study of Social Change in Colonial Africa,"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 12, No. 4/5, 1971.
- ⑤ A. Kuper, *Anthropology and Anthropologists: The British School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2015, p. 134; J. Goody, *The Expansive Moment: The Rise of Social Anthropology in Britain and Africa 1918 - 197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⑥ D. Forde, "Anthropolog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frican Studies," *Africa*, Vol. 37, No. 4, 1967. "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非洲研究一直在某种程度上为人类学所垄断，60 年代仍主导着英国人类学。" A. Kuper, *Anthropology and Anthropologists: The British School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 78.
- ⑦ G. William, *The Expansion of Europe in the XVIII Century: Overseas Rivalry, Discovery and Exploitation*, New York: Walker & Company, 1967, pp. 17 - 30;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艾里克·威廉斯：《生而无权：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陆志宝、彭坤元、张晓华译，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4 年版。

质要求和由此而来的殖民利益冲突需要欧洲列强之间的政治合作。1884 年柏林会议通过列强之间的妥协初步解决了殖民地瓜分问题，但是殖民统治的合法性及其维持需要意识形态上的配合。法属西非殖民地和法属赤道非洲分别于 1895 年和 1910 年建立。《法属赤道非洲参考书目》(Bibliographic de l'Afrique Equatoriale Française, 1914) 收集文献 7000 余种，《法属西非参考书目》(Bibliographie de l'Afrique Occidentale Française, 1937) 收集文献达 9500 余种。这些早期文献的作者主要是殖民地官员和传教士，研究赤道非洲的法国社会学家巴兰蒂尔称之为“非专业人士”。^① 他们的共同点在于对他族历史和文化充满偏见，认为自己是在传播文明。文化偏见的产生是一种历史现象，又往往通过个人体现出来，并且可能会导致两种结果：一种情况是文化偏见成为政治的“婢女”；另一种理想的结果是不同文明相互包容和理解后产生文明互鉴。^②

在资本主义兴起并需要原料、市场和劳动力的条件下，白人天生优越感这种建立在生理特征上的自我表达与欧洲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扩张完美结合。“从这一点出发，各种人类学流派在西方经验的框架内，根据不断变化的趋势，发展了描述‘原始’的模型和技术。”^③ 这一现象可从两方面解释：一是意识形态，涉及学者对社会意识和主导群体确定规范的认知；二是自 18 世纪末以来，自然科学关于进步等方面的知识对社会科学产生了影响。随着殖民统治的确立，各欧洲帝国在学校建设、学科学术及话语体系方面的建构无一不与帝国利益相关。^④ 西方现代教育制度开始在非洲建立。

除个别较早的学校如塞拉利昂的福拉湾学院 (1827) 外，^⑤ 英法殖民者从 20 世纪初开始根据需要设立了一些专门培养为殖民政府服务的非洲人学校，如法国在塞内加尔为培养酋长子弟设立的威廉·庞蒂学校 (1903)，^⑥ 英国在苏丹设立

① 以德拉福斯为代表的殖民官员和以特里尔斯为代表的传教士。G. Balandier, “The French Tradition of African Research,” *Human Organizations*, Vol. 19, No. 3, 1960, pp. 108 - 109; G. Balandier, “Approche sociologique des ‘Brazzavilles Noires’: Etude prelimiaire,” *Africa*, Vol. 22, No. 1, 1952, pp. 23 - 34; G. Balandier, *Sociologie actuelle de l'Afrique noir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55.

② 李安山：《释“文明互鉴”》，《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年第 4 期，第 45 页。

③ V. Y. Mudimbe, *The Invention of Africa: Gnosis, Philosophy, and the Order of Knowledge*,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17.

④ F. D. Lugard, “Education in Tropical Africa,” *The Edinburgh Review*, July 1925 (Reprint for Colonial Office, 1930).

⑤ 1876—1967 年，塞拉利昂的福拉湾学院授予学生的是杜伦大学的证书。感谢多伦多大学同窗好友、塞拉利昂大学历史系 Ibrahim Abdullah 教授提供的信息。

⑥ 名称来自去世的法属西非总督威廉·庞蒂。P. R. Sabatier, “Educating a Colonial Elite: the William Ponty School and its Graduates,”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hicago, Department of History, August 1977, p. 15.

的戈登学院（1902）、乌干达的麦克雷雷学院（1922）、黄金海岸（今加纳）的阿契莫塔学校（1927）等。尼日利亚伊巴丹的亚巴学院于1934年正式开学，隶属于伦敦大学。二战后，西非社会经济研究所在伊巴丹成立，1956年分为两部：尼日利亚社会经济研究所和隶属加纳大学的经济研究部。殖民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训练有素、忠实而有纪律的殖民统治的执行者和符合殖民宗主国道德规范的民众，同时收集当地资料并进行研究。^①

1925年法国政府就公共教育问题发布文件，建立村社学校、地区学校、高等小学，要求学生学习有关法国及殖民地的历史地理知识。^② 1931年法国殖民地及海外领土教育会议确定教育改革的宗旨为，通过初级教育向非洲青年灌输殖民奴化知识。二战后，法属殖民地高校开始出现，如1954年的达喀尔大学。1954年天主教会在金沙萨建立的鲁汶大学（金沙萨大学），1955年比利时殖民当局在比属刚果、卢旺达和布隆迪创办官方大学。在1896年法国殖民政府建立的医学院基础上，塔那那利佛高等研究院（马达加斯加大学和塔那那利佛大学）于1955年成立。^③ 随后，科特迪瓦、喀麦隆、多哥和刚果（布）等法属殖民地也相继建立了高校。由于法国极力将非洲人纳入其教育体系，部分非洲学生出现了问题，或成为社会寄生虫，或从宗主国继承了权力以及对非洲的偏见，实际上仍然受西方的“文化奴役”。“非洲人民确实需要重新发现自己及其文化遗产。这意味着要找出并改变殖民史学对非洲历史的否定和虚假建构，摒弃自我仇恨的因素，重新发现自己的宗教、政治、科学、技术和社会遗产，并利用这些遗产作为重建非洲各国教育制度的基础。”^④

英帝国在发展殖民教育方面特别重视留学英国的非洲学生。根据1945年《殖民地发展和福利法》，10年内的1.2亿英镑中有2350万英镑作为中心项目资金，包括将殖民地学生送到英国接受大学教育或在殖民地开办大学以培训管理人员。为了培养殖民政府工作人员，英国殖民部定期请剑桥、牛津等校学者对他们进行培训。^⑤ 1947年殖民官员杰弗里斯提交的《在英国的非洲学生的政治意义备

① L. Mair, "The Social Sciences in Africa South of Sahara: The British Contribution," *Human Organisation*, Vol. 19, No. 3, 1960. 另一个研究机构是实际成立于1938年（正式宣布为1940年）的罗得斯-利文斯敦研究所。

② "Circular Number 8 Concerning the Organization of Public Education, Brazzaville, May 8, 1925," in David G. Scanlon (ed.), *Traditions of African Education*, William Byrd Press, 1964, pp. 119 - 125.

③ 有关殖民时期一些非洲大学建立的时间有多种说法，如黄金海岸是1949年，塞内加尔是1950年，塔那那利佛高等研究院是1956年。

④ B. Andah, *African Anthropology*, Ibadan: Shaneson Limited, 1988, pp. 5 - 6.

⑤ 李安山：《日不落帝国的崩溃——论英国非殖民化的“计划”问题》，《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第184—185页。

忘录》建议：从社会、教育和政治方面施加影响，组织参观英国地方政府运作，发行留英学生名册，到有教养的英国家庭做客，殖民地总督与留学生交流，并强调这些活动应保持低调和非官方性质。1950 年有 1713 名殖民地学生在英国大学学习，另有 2480 人在英国研究机构学习，其中 1500 人由殖民地政府或殖民地发展和福利基金资助。这些学生大多学习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专业，被作为未来殖民政府管理人才培养。^①

各所大学尽力为帝国利益服务，其中剑桥、牛津等大学建功卓著。以牛津大学为例，殖民史教授埃格顿指出：“每一座学校建筑都是帝国堡垒，每一位教师都是帝国哨兵。”^② 英国在师资和学生培养上以维护帝国利益为目的，也根据殖民地不同情况建立了不少培养帝国官员或当地精英的学校。1923 年英国政府决定成立英国热带非洲教育咨询委员会，1925 年该委员会制定了殖民地教育原则并使之成为殖民教育政策的基础。^③ 英国人在初等教育上采用当地语言，从而为学习英语铺平道路。英帝国在亚洲、非洲和美洲殖民地的一些学校直接隶属于英国著名大学如剑桥、牛津、杜伦大学等，有的学校在殖民统治后期升级为这些大学的分校。这些学校的负责人多与牛津大学有关，如戈登学院的校长考克斯（C. Cox）、阿契莫塔学院的校长弗雷泽（A. Fraser）、麦克雷雷大学的校长乔治·特纳（G. Turner）等。

非洲统一组织秘书长萨利姆指出：“殖民政府是为确保和维持将要独立国家的从属地位而量身定做的……殖民教育仅限于培训极少数低级官员，并没有使非洲人为最终承担现代国家事务的领导和管理工作做好准备。”^④ 尽管这些大学为殖民政府培养服务者，但其中许多人加入民族主义运动，成为殖民统治的掘墓人，如塞内加尔的桑戈尔、加纳的恩克鲁玛等。^⑤ 1925 年在伦敦留学的西非学生自发组织起来成立西非学联，目标包括“培养自助、团结、合作的精神”，“在成员中培养一种民族意识和种族自豪感”。法属西非留学生也很活跃，一战后就

-
- ① Ronald Hyam (ed.), *The Labour Government and the End of Empire, 1945 - 1951, Part III*, London, 1992, CAB 12 9/41, CP(50)171, Document 356.
- ② H. E. Egerton, "Lectures on British Coloni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Rhodes House, Oxford, MS. Lecture XV, p. 33; R. Symonds, *Oxford and Empire: The Last Lost Cause?* Palgrave Macmillan, 1986, p. 53.
- ③ Advisory Committee on Native Education in the British Tropical African Dependencies, *Education Policy in British Tropical Africa*, London: His Majesty's Stationary Office, 1925, pp. 3 - 8.
- ④ V. Brittain, "Africa, The Lost Continent," *New Statesman and Society*, London, April 8, 1994, p. 8.
- ⑤ 肯尼亚独立后任劳工部长的汤姆·姆博亚回忆他在牛津大学的日子，提到自己在学校可以读书并认真思考今后的道路。Tom Mboya, *Freedom and After*, London: Andre Deutsche, 1963, pp. 56 - 58.

成立了一些非洲学生组织，以 1933 年在巴黎成立的西非学生协会影响最大，其宗旨是“同化欧洲文化，与你们的人民保持紧密联系”。协会每月举行各种座谈，“由于经常交换意见，西非学生可以逐渐培养一种共同的思想意识”，一些活跃分子均成为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①

殖民教育与殖民统治紧密相联。加纳大学的前身黄金海岸大学于 1948 年成立，是二战后英国殖民政府加强教育策略的反映。由于教育目的是为殖民统治培养管理人员，实用技术人员很少，因而上过学的失业者日益增多。^② 学校培养对象多与殖民统治直接相关，以牛津大学为例，1913 年录取的 41 名攻读证书的学生中，20 名是殖民官员，在非洲各殖民地工作，另外 10 名也在谋求类似职位。^③ 人类学系培养的学生对维护英国在非洲的殖民统治起到重要作用，例如拉特雷对阿散蒂人的研究成为殖民统治与人类学相结合的典型。^④ 此外，艾萨克·萨佩长期在伦敦经济学院担任教授，曾受贝专纳兰保护地（今博茨瓦纳）殖民政府的委托，在当地调研茨瓦纳人的生活习俗与经济情况，研究报告出版后成为殖民当局实施统治的工具书，至今仍在不断重印。^⑤ 米克对尼日利亚的研究使英国的间接统治得以延长，他提议殖民政府为人类学家提供资料以便“帮助政府最大限度地使本土制度成为地方政府管理的工具”^⑥。他受到人类学系主任马雷特

- ① 李安山：《论西非民族知识分子的特点及其在民族独立运动中的作用》，《世界历史》1986 年第 3 期。
- ② P. J. Foster, *Educa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Ghana*, London, 1965, pp. 292 - 304. 还可参见 [肯尼亚] 阿里·A. 马兹鲁伊主编、旺济助理主编：《非洲通史（第八卷）：一九三五年以后的非洲》，屠尔康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3 年版，第 116、469—470 页。
- ③ *Royal Commission on Oxford and Cambridge Universities; Report*, Cmd 1588, London, 1922; MS Appendix, Evidence of R. R. Marett. R. Symonds, *Oxford and Empire: The Last Lost Cause?* Palgrave Macmillan, 1986, p. 154.
- ④ R. S. Rattray, *Ashanti*,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3; R. S. Rattray, *Religion and Art in Ashanti*,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1927; R. S. Rattray, *Ashanti Law and Constitu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9. 拉特雷入职前参加过布尔战争，在非洲大湖公司工作过。他具有语言天赋，喜欢搜集民间传说，1907 年加入黄金海岸殖民政府，1909 年休假期间在牛津大学获人类学学位证书。总督戈登·加吉斯伯格爵士（Sir Gordon Guggisberg）委任他为殖民政府人类学部门的负责人。T. C. McCaskie, “R. S. Rattra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sante History: An Appraisal,” *History in Africa*, Vol. 10, 1983, pp. 187 - 206.
- ⑤ Issac Schapera, *A Handbook of Tswana Law and Custom*, Compiled for the Bechuanaland Protectorate Administr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8; I. Schapera, *Married Life in an African Tribe*, Faber and Faber, 1940; I. Schapera, *Migrant Labour and Tribal Life: A Study of Conditions in the Bechuanaland Protectorat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7; I. Schapera, *Praise - poems of Tswana Chiefs*, Clarendon Press, 1965; I. Schapera,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Tribal Societies*, London: Watts, 1956.
- ⑥ C. K. Meek, *The Northern Tribes of Nigeria*, Volume 2,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5; C. K. Meek, *Law and Authority in a Nigerian Trib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7, p. xv.

(R. R. Marett) 的鼓励, 退休后回到牛津大学教授殖民管理相关课程。

一批为英帝国立下汗马功劳的殖民官员和学者均与牛津大学有关, 如 1902 年在牛津大学设立罗得斯 (一译“罗兹”) 奖学金的殖民主义者和开普殖民地首相 (1890—1896) 罗得斯 (C. Rhodes),^① “两度为拯救帝国做了大量工作” 的英国驻南非高级专员和开普殖民地总督米尔纳勋爵 (Lord Milner),^② 第一部有关英国殖民政策著作的作者埃格顿 (H. E. Egerton), 在英属印度殖民地服务多年后负责编写《非洲概览》的海利勋爵 (Lord Hailey), 极力主张牛津大学应培养殖民地本地文官和帝国殖民官员并撰写东非历史的库普兰爵士 (Sir Reginald Coupland),^③ 启动牛津大学殖民档案项目并一生致力于贯彻英帝国在非洲道德征服事业的佩勒姆女士 (Dame Margret Perham),^④ 等等。限于篇幅, 这里只举两个例子, 一位是殖民史教授埃格顿, 另一位是退休后承担编撰《非洲概览》的海利勋爵。

1876 年毕业于牛津大学的埃格顿对英帝国有深厚感情, 1885 年成为后来任殖民部国务大臣的斯坦霍普 (E. Stanhope) 的私人秘书。他对殖民政策感兴趣, 于 1897 年出版有关英国殖民政策的著作, 探讨了从 1497 年卡博特远征到 1894 年渥太华殖民地大会时期英帝国扩张历史中殖民政策的变化。他将贸易持续性与系统殖民化相联系, 考察 19 世纪中叶自由放任政策的兴衰, 从而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一个整体框架。^⑤ 1905 年埃格顿成为牛津大学的殖民史教授, 他在强调商业重要性的同时, 指出帝国的最终合法性在于道德: “一个帝国的好坏取决于其管理者的性格。由于个人 (管理者) 性格的改善, 我们可以诚实地说, 英国的持续扩张不仅符合本岛贸易和人口的利益, 而且符合受其影响人口的利益, 也符合整个世界的利益。”^⑥ 埃

-
- ① Richard Symonds, *Oxford and Empire: The Last Lost Cause?* Palgrave Macmillan, 1986, pp. 161 – 181; [英] 巴兹尔·威廉姆斯:《塞西尔·罗得斯传》, 刘伟才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8 年版。本人曾有机会在 1989 年下半年到牛津大学罗得斯之家 (Rhodes House) 查阅档案资料。
- ② Lord Milner, *England in Egypt*, London: Edward Arnold, 1892; Lord Milner, *The Nation and the Empire*, London: Constable and Company, 1913; Lord Milner, *Questions of the Hour*,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Limited, 1925.
- ③ R. Coupland, *East Africa and Its Invader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Death of Seyyid Said in 1856*,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8.
- ④ Dame Margery Perham, *Native Administration in Nigeri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7; Dame Margery Perham, *The Colonial Reckoning*, London: Collins 1961; Dame Margery Perham, *Colonial Sequence 1930 to 1949: A Chronological Commentary upon British Colonial Policy Especially in Africa*, London: Methuen, 1967.
- ⑤ H. E. Egerton, *A Short History of British Colonial Poli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 ⑥ H. E. Egerton, “Lectures on British Coloni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Rhodes House, Oxford, MS. Lecture XIV, pp. 31 – 32; Richard Symonds, *Oxford and Empire: The Last Lost Cause?* Palgrave Macmillan, 1986, p. 52.

格顿将英国殖民利益与所谓“普世性”的自由主义情怀联系起来，这一具有道德感的说教极大地影响了牛津大学殖民史教学。英国人具有高度优越感和自豪感，并力图从法理上证明帝国殖民使命的合法性，这种价值观成为牛津大学殖民史学家的一个突出标志。

另一位牛津大学培养出来的殖民官员兼学者是海利勋爵，因《非洲概览》而闻名于学界。^① 这本书是殖民统治困境下不同统治方式争论的结果，“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代人关于非洲问题辩论的产物”^②。《非洲概览》总务委员会主席洛锡安勋爵指出该书的资政作用：“标志着该大陆历史上的一个新时代，不仅来自工作本身的质量，而且因为它将使政策制定者考虑到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整体问题。”^③ 海利勋爵在编写书的过程中历经磨难，甚至面临生命危险。^④ 当时，已有三部涉及英国殖民统治的著作出版，^⑤ 而《非洲概览》从视野、论题和内容上均有超越，该书共 25 章 1800 多页，包括有关非洲各方面事务的著述，列出各种实际问题，最后专列一章提出对非洲研究的设想，包括研究范围和机构、官方调查、研究基金及综合信息机构的设立等。“以目前所采取的形式，它不仅限于讨论我们对非洲发展所涉问题的了解状况，还试图描述这些问题产生的客观因素和社会背景，并分析解决办法。”^⑥ 海利勋爵因此成为非洲问题专家，也更关注学

① 当时，长期在南非工作的英国历史学家麦克米伦申请承担《非洲概览》的编写工作，但英国政府担心将这份工作委托给他会遭到南非政府和所有定居者的反对。1932 年，麦克米伦对赫尔佐格制定的土著和白人劳工政策极为不满，写信批评司法部长，最后被迫离开南非。这种与南非政府不合作的关系影响了他的学术生涯，《非洲概览》的编写工作最终交由对非洲一无所知的海利勋爵。W. M. Macmillan, *My South African Years* (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 Penguin Books [1938], 1949, p. 244.

② 以前学界认为编写《非洲概览》是史末资将军于 1929 年提出，塞尔反驳了这一观点。John W. Cell, “Lord Hailey and the Making of the African Survey,” *African Affairs*, Vol. 88, No. 353, October 1989, p. 481. 作者认为，英国对非洲的政策是在两大流派互动中形成。一派主导南部、中部和东部非洲地区，强调通过白人主动性、资本及对黑人移民劳力的管理，非洲“按自己路线”演进及种族隔离实现经济发展。第二派以西非和乌干达为中心，强调农业生产、保护非洲利益和间接统治。塞尔有关这场争论的派别之分及其论点有武断之嫌。

③ Lord Hailey, *An African Survey: A Study of Problems Arising in Africa South of the Sahar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8, pp. v - vi.

④ 对非洲情况缺乏了解给海利勋爵造成巨大压力，并因此病倒。《非洲概览》前言和塞尔的文章均提到他在写作过程中生病这一点。

⑤ F. D. Lugard, *The Dual Mandate in British Tropical Africa*, London: Frank Cass, 1965 [1922]; R. L. Buell, *The Native Problem in Africa*, New York: Macmillan, 1928; Sir Keith Hancock, *Survey of British Commonwealth Affair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7.

⑥ Lord Hailey, *An African Survey: A Study of Problems Arising in Africa South of the Sahara*, p. xxiii. 《非洲概览》的修改版于 1956 年完成，1957 年出版。

术的作用。^① 他的《人类学在殖民发展中的作用》成为人类学为殖民统治服务的重要文献，他在文中提出诸多相关建议。^②

就人类学而言，既有学界对异域知识的探究和追求，更重要的是反映了权力关系的需求和支撑。当时，人类学的研究兴趣、课题立项、田野调查及成果发表等诸方面均依赖政府，这在殖民统治建立后尤其明显，如政府审批、调研安排或提供资助等。人类学家对当地人民的同情出于自由主义倾向，要求殖民改革要以维持宗主国统治为前提。人类学研究多为亲历，其缺陷性亦很明显——诸多资料或为殖民官员、代理人、传教士和受雇用的本地人提供，或为自己所收集。^③ 即使是个人收集的资料，也因固定的任务、立场或视角而趋于片面。然而，人类学家经常忘记，“他不是完美的双语者，因此尽管他具有科学背景，他的知识建构可能只是一个值得怀疑的‘发明’。”^④ 对人类学家在殖民地所获知识客观性的质疑随后论及。

殖民统治与学科建构的互动关系

现代社会科学的形成以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的学科化、制度化、独立化和国际化为标志，得益于多种因素，除国家制度需要外，还包括历史积淀、社会需求、科学发展、信息交流等。世界各种文明为社会科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不仅包含埃及、印度、中国等早期文明成果，更体现在阿拉伯学术传统中，如被汤因比誉为“历史形态学研究杰出天才”的社会科学大师伊本·赫勒敦（1332—1406），他的贡献颇为显著。^⑤ 15 世纪以来的全球联系不仅

- ① 除《非洲概览》外，他还发表了不少有关非洲问题的文章。W. M. Hailey, "Nationalism in Africa," *Journal of the Royal African Society*, Vol. 36, No. 143, April 1937, pp. 134 - 147; W. M. Hailey, "Colonies and World Organisation," *African Affairs*, Vol. 44, No. 175, April 1945, pp. 54 - 58; Lord Hailey, "World Thought on the Colonial Question," *African Studies*, Vol. 6, No. 2, 1947, pp. 51 - 56; W. M. Hailey, "The Foundation of Self - Government in the African Colonies," *African Affairs*, Vol. 47, No. 188, July 1948, pp. 147 - 153; Lord Hailey, *The Future of Colonial Peopl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3.
- ② Lord Hailey, "The Role of Anthropology in Colonial Development," *Man*, Vol. 44, Jan. - Feb., 1944, pp. 10 - 16.
- ③ S. C. Fenton, "Race, Class, and Politics in the Work of Emile Durkheim," in UNESCO (ed.), *Sociological Theories: Race and Colonialism*, Paris: UNESCO, 1980, pp. 143 - 181.
- ④ V. Y. Mudimbe, *The Invention of Africa: Gnosis, Philosophy, and the Order of Knowledge*, p. 67.
- ⑤ 参见 Arnold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 499; Arnold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Volume XII): Reconsiderati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 205; [突尼斯] 伊本·赫勒敦:《历史绪论》，李振中译，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王新中:《阿拉伯世界的孟德斯鸠——突尼斯经济思想家伊本·赫尔敦的贡献》，《西亚非洲》2001 年第 1 期；冯杰文:《19 世纪以来伊本·赫勒敦社会历史哲学思想研究综述》，《西亚非洲》2012 年第 2 期。

使世人眼界大开，而且使各地文明交汇融通，为学术交流提供了机会。^① 17—18世纪社会科学理想主义和启蒙主义思想的传播，19世纪实证科学、博爱精神、进化观点与自然科学的发展，都为社会科学提供了方法和工具，促进社会科学学科化发展。^② 不可否认，欧洲殖民帝国的建立与殖民统治为学科建构提供了思想、动力和物质基础。

人类学是随着资本主义在世界扩展以及殖民扩张需求增强而兴盛的一门学科，其作用体现在直接为殖民统治服务。加纳首任总统恩克鲁玛认为，“人类学对非洲社会的阐述是以促进文明进程的说辞为殖民主义辩护，这也是人类学时髦的根本。”^③ 尽管人类学被称为“殖民主义之侍女”^④ 或“西方帝国主义之子”^⑤，但是有两点不容否认：一是殖民事务与人类学家及其成果之关系依不同殖民政府和不同时期而异，二是人类学研究对社会科学作出贡献，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学在反思与探索中进行了必要改革并取得进步。^⑥ 彼得·福斯特在讨论人类学与殖民主义的关系时指出：“如果人们认可人类学的产生主要是出于殖民地治理的需要，那么随着殖民帝国被肢解，人类学确实将遭受身份危机。”^⑦ 这里既提出了人类学的学科自我认同危机，也激发了对两者关系的探究。研究发现，殖民政府对人类

- ① George G. M. James, *Stolen Legacy Greek Philosophy Is Stolen Egyptian Philosophy*, Africa World Press, 2001; J. J. Clarke, *Oriental Enlightenment: The Encounter between Asian and Western Thought*, London: Routledge, 1997; John M. Hobson, *The Eastern Origin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② 关于科学技术与学科发展的关系，参见 [英] W. C. 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李珩译，商务印书馆 1975 年版，第 388—428、469—85、631—44 页。福柯以考古学的方法研究人类知识的产生。参见 [法] 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230—31 页。
- ③ 转引自景军：《人类学思想的他者建树》，载景军、高良敏主编：《南部理论：人文社科思想的他者建树》，第 192 页。文中指出恩克鲁玛是人类学硕士。然而，根据恩克鲁玛自传，他 1939 年从林肯大学毕业，获得文科学士学位，主修经济学和社会学；“1942 年我在林肯大学神学院毕业，获得神学学士学位”；“同年，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教育硕士学位”；“1943 年 2 月，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哲学文科硕士学位”。《恩克鲁玛自传》，国际关系研究所翻译组译校，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34—36 页。
- ④ Talal Asad (ed.), *Anthropology and the Colonial Encounter*, London: Ithaca Press, 1975 [1973], p. 16.
- ⑤ K Gough, “Anthropology and Imperialism”, *Monthly Review*, Vol. 19, No. 11, April 1968, p. 12.
- ⑥ J. Goody, *The Expansive Moment: The Rise of Social Anthropology in Britain and Africa 1918 - 197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87 - 117; Fredrik Barth, Andre Gingrich, Robert Parkin, Sydel Silverman, *One Discipline, Four Ways: British, German, French, and American Anthropology* (Halle Lecture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人类学的趋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王铭铭：《近代人类学史的另一条线索》，《西北民族研究》2012 年第 3 期。
- ⑦ P. Forster, “Empiricism and Imperialism: A Review of the New Left Critique of Social Anthropology,” in Talal Asad (ed.), *Anthropology and the Colonial Encounter*, p. 27.

学研究的需求主要是在殖民征服完成后的统治过程中逐步产生的。

殖民统治早期对人类学的需求并不迫切。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英国政府对人类学的看法是“重要却无用”。^① 然而，国际资本已将注意力转到与资本扩张和殖民统治密切相关的学术研究上。萨拉蒙从历史角度分析了 1913 年成立的洛克菲勒基金会是如何影响国际非洲研究所和英国非洲人类学发展的。在基金会的资助下，“他们（研究所理事会）决心集中研究殖民地政府、教育工作者和在非洲从事实际工作的其他人最直接关心的问题。”^② 1922 年卢加德有关双重委任制的著作发表，马林诺斯基看后表示：“如果他想从科学上控制人类学家以符合他的帝国思想，他只能建立功能学派。卢加德的间接统治是对功能学派观点的完全屈服。”^③ 此言表现了学术研究与殖民统治的互动。除了前面提到的拉特雷和米克外，塔尔博的研究显示出实用意义。^④ 20 世纪 30 年代，“人类学在殖民地治理中的重要性被广泛接受。”^⑤ 马林诺斯基指出：“人类学过去是研究迟钝、渐进和落后的存在和事物，现在面临着记录‘野蛮人’如何成为现代文明积极参与者的艰巨任务。”^⑥ 人类学要认识他者群体中调节个人和集体生活行为的因素及对外来力量的反应方式，一批人类学家被殖民政府委任到各地进行研究。海利勋爵的著作和他在 1944 年发表的关于人类学对殖民地发展之作用的讲话加强了殖民政府与人类学家的关系。

当时，间接统治制度成为人类学为殖民统治政策服务的重点研究对象，难怪有人认为，“非洲的间接统治是英国人类学的铸模。”^⑦ 卢加德的著作成为英国传播“文明使命”的经典。除北尼日利亚外，双重委任制也在其他殖民地实施。1926 年坦噶尼喀的一位地区行政官表示：“部落应作为一个有酋长和边界的地方单位。”^⑧ 法

-
- ① Stephen Feuchtwang, “The Colonial Formation of British Social Anthropology,” in Talal Asad (ed.), *Anthropology & the Colonial Encounter*, p. 82.
- ② Frank A. Salamone, “The International African Institute: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ritish Social Anthropology in Africa,” *Transforming Anthropology*, Vol. 9, No. 1, 2010, pp. 21 – 22.
- ③ John W. Cell, “Lord Hailey and the Making of the African Survey,” *African Affairs*, Vol. 88, No. 353, October 1989, p. 483.
- ④ P. A. Talbot, *Life in Southern Nigeria*, London: Macmillan, 1923; P. A. Talbot, *Peoples of Southern Nigeria*, 4 vols., London: H. Milford, 1926.
- ⑤ Symonds, *Oxford and Empire: The Last Lost Cause?* p. 155.
- ⑥ B. Malinowski et al., *Methods of Study of Culture Contact in Afric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8, p. vii.
- ⑦ Stephen Feuchtwang, “The Colonial Formation of British Social Anthropology,” p. 99.
- ⑧ I. D. Graham, “Indirect Rule: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efs’ and ‘Tribes’ in Cameron’s Tanganyika,” *Tanzania Notes and Records*, Vol. 77, 1976, p. 4.

勒士有关乌干达巴苏加人社会结构的研究，也有助于实行间接统治。^①“这是对一种社会工程的呼吁，间接统治要求将人口重组为地方酋邦。如果这些不存在，就必须创建它们。”^②要实现间接统治，必须熟悉“他者”的社会系统即政治制度、人际关系、宗教信仰及生存法则。殖民政府要将“他者”引入“现代社会”，须借助人类学知识。以传统本土机构为基础建立新机构很有价值，因为殖民当局在改革社会和政治结构时必须依赖这些机构，这是间接统治制度的基本原则，它在非洲相当多的地区是成功的。“要成功运作这一体系，需要对本土机构进行比上一代人更深入的研究，这种类型的研究需要人类学家的特殊技术。”^③殖民地为人类学家提供了研究传统社会机制及其适应和变化的素材，而这些研究成果反过来可以作为有效统治的根据。

学科建构与殖民统治的互动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一是学术研究和学科充实既要依靠相关机构的支撑，也需要一定的经费支持。反过来，学科建立及其研究成果为殖民机构提供工具、思想和基础。二是殖民政府从大学请来学者就特定问题进行调研并提出建议，或是学者意识到自身研究与殖民统治有关并致力于相关研究。三是欧洲各国政府组织相关殖民地研究机构或殖民地总督直接任命学者为官员。四是由政府委托与殖民政策相关的研究成果直接由皇家文书出版署出版，以服务于相关部门特别是殖民部的运作。学术研究需要某种类型的资助，提供者与接受者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契约关系。殖民统治时期，研究者受到资助者的多种影响，如研究项目应使资助者受益，研究结论往往置资助者的利益于科学性之上；如果项目涉及外国研究，还需要根据外交政策来决定其内容取舍和运用范围；不遵守约定的研究者后续实地调查甚或其学生的研究均会受到影响。^④

作为早期学术中心，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初建的目的是为帝国提高殖民官员的语言能力。^⑤1900年伦敦大学拒绝关于创建东方语言、历史和考古系的建议。1907年英国财政部委任雷伊委员会进行有关东方研究的调研。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于1916年成立，但正式宣布成立的日期是1917年2月23日，在资金不足的

① L. A. Fallers, *Bantu Bureaucracy: A Study of Integration and Conflict in the Political Institution of an East African People*, W. Heffer & Sons Ltd., 1956.

② Adam Kuper, *Anthropology and Anthropologists: The British School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2015, p. 66.

③ Lord Hailey, "The Role of Anthropology in Colonial Development," *Man*, Vol. 44, Jan. - Feb., 1944, p. 13.

④ Stephen Feuchtwang, "The Colonial Formation of British Social Anthropology," pp. 70 - 77.

⑤ Ralph Russell, *Oriental Despotism: A report on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London: Council for Academic Freedom and Democracy, 1973.

情况下开始运作，当时需年金 14000 英镑，而实际只有 9133 英镑。^① 洛克菲勒基金会等向其提供了资助，但是经费依然严重缺乏。^② 学术研究与殖民统治的互动关系十分明确。政府在塞利格曼的建议下出资让埃文思 - 普里查德去苏丹调研，条件是在规定时间里以对行政官员有用的合适方式向苏丹政府提交一份研究报告。^③ 后来研究经费问题因海利勋爵的努力得到缓解。殖民地发展与福利基金设立后每年拨出 50 万英镑用于殖民地研究，1945 年后增至 100 万英镑，人类学家积极进行田野调查并出版成果。^④ 政府需要当地语言教育和相关研究，同时为这种服务提供经费并创造便利条件。^⑤

殖民政府遇到实际问题时直接请学者进行调研并提建议，学者也意识到自己的研究与殖民统治有关，双方合作有不少例子。例如，殖民政府迫切希望了解努尔人造反的原因，埃文思 - 普里查德对努尔人的研究即为殖民政策提供依据，也成为人类学家服务政府的典范。^⑥ 此外，还有杜克对北罗得西亚的民族志调查，比默对斯威士兰军事组织的研究，理查兹对北罗得西亚地区土地、劳力和日常食物的研究，佩里斯坦尼对肯尼亚基普西基人社会机构的研究，夏佩拉在肯尼亚考

-
- ① Ian Brown,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Imperial Training and the Expansion of Learn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37 - 40.
- ② Ian Brown,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Imperial Training and the Expansion of Learning*, pp. 70 - 82. 1938 年获各殖民地政府 4380 英镑资助。
- ③ H. MacMichael, Letter dated 10th Jan. 1919, No. C. S. /17/M/1. Financial Secretary, S. G. Khartoum, GGC/296 - 99, File 18. D. 7, Sudan Law Project, University of Khartoum. Abdel Ghaffar M. Ahme, "Some Remarks from the Third World on Anthropology and Colonialism: The Sudan," in Talal Asad (ed.), *Anthropology & the Colonial Encounter*, p. 267.
- ④ Lucy Mair, "The Social Sciences in Africa South of Sahara: The British Contribution," *Human Organisation*, Vol. 19, No. 3, 1960, pp. 98 - 107. 1945—1960 年间，73 名英国人类学家在非洲进行 90 个民族的田野调查或发表成果，其中东非 35 人（39 个民族），西非 18 人（21 个民族），中部非洲 14 人和南部非洲 6 人。
- ⑤ Lord Hailey, *An African Survey: A Study of Problems Arising in Africa South of the Sahara*, p. 1630; Ian Brown,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Imperial Training and the Expansion of Learning*, pp. 198 - 199; Donald Fischer, "Rockefeller Philanthropy and the Rise of Social Anthropology," *Anthropology Today*, Vol. 2, No. 1, 1986; F. X. Sutton and D. R. Smock, "The Ford Foundation and African Studies," *Issue: A Journal of Opinion*, Vol. 6, No. 2/3, 1976; J. T. Saunders, R. L. Turner and D. Veale, *Report to the Nuffield Foundation on a Visit to Nigeri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 ⑥ E. E. Evans - Pritchard, *The Nuer: A Description of the Modes of Livelihood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f a Nilotic Peopl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0 (已有中文版); Adam Kuper, *Anthropology and Anthropologist: The British School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2015, p. 56.

察中发现的问题，瑞德就流动劳工对尼亚萨兰乡村生活影响的研究等。^① 福蒂斯对黄金海岸的研究促使殖民政府就统治北部领地咨询其意见。比姆的研究与夏佩拉对贝专纳保护地法律制度的调查均应保护国当局之邀，斯坦纳博士对肯尼亚土地使用权的调查与卡尔维克夫妇对坦噶尼喀人生活和营养问题的调研都与殖民政府的要求有关。^②

欧洲国家为了自身利益设立各自的殖民研究机构，各种专业人才对特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进行研究并出版不少成果，其中英国最为突出。1927年帝国农业研究大会召开后，一些研究机构增设帝国土壤研究、动植物基因、动物营养与健康、水果生产及森林等8个相关部门，殖民部成立卫生和热带疾病局，大学及相关机构在社会科学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早期官方研究项目由国际非洲语言和文化研究所（简称“国际非洲研究所”，1926年成立）组织并受到殖民部的支持，后来由牛津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配合。有关英国殖民地语言的学习与研究主要由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承担。尼日利亚和黄金海岸等少数殖民政府设有政府人类学官员职位，^③ 但是殖民地政府难以满足专项调查所需人力。英国政府资助目的明确，这些研究项目成就了一些人类学家，如埃文思-普里查德对努尔人的研究使他成为功能主义人类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学科建设与殖民统治的互动还表现在研究成果发行上。皇家文书出版署代表殖民部出版的研究成果有各种咨询委员会或研究理事会的报告及其委托的项目研究报告，包括殖民地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和殖民地经济研究委员会的研究成果。殖民地调查研究系列中的17项课题由人类学家完成，7项由殖民地经济研究委员会委托的经济学家撰写，1项由语言学家完成。有的成果囿于性质或研究对象，资助者要求不公开发表或仅

① C. M. Doke, *The Lambas of Northern Rhodesia*, London: G. G. Harrap & Co., 1931; H. Beem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ilitary Organization in Swaziland," *Africa*, Vol. 10, 1937, pp. 176 - 204; A. I. Richards, *Land, Labour and Diet in Northern Rhodes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9; A. I. Richards, *Bemba Marriage and Present Economic Conditions*, Livingstone: Rhodes - Livingstone Institute, 1940; P. J. Peristany, *Social Institutions of the Kipsigis*, London: Routledge Kegan & Paul, 1939; I. Schapera, *Some Problems of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in Kenya Colon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9; Margaret Read, *Children of Their Fathers: Growing Up among the Ngoni of Nyasaland*,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0.

② R. Brown, "Anthropology and Colonial Rule: Godfrey Wilson and Thee Rhodes - Livingstone Institute, Northern Rhodesia," in Talal Asad (ed.), *Anthropology and the Colonial Encounter*, pp. 173 - 197; Audrey I. Richards, "The Colonial Office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Social Research?" *Anthropological Forum*, Vol. 4, No. 2, 1977.

③ Lord Hailey, *An African Survey: A Study of Problems Arising in Africa South of the Sahara*, p. 1614.

限于某些读者群体。^①

殖民需求与学科建构的关联在各学科均有体现，人类学相当突出。以前政府调查目标限于自然科学如河流山脉、矿产分布、植物资源等。经过多年实践，政府意识到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问题，人类学对这种需求的满足从 20 世纪 20 年代始，30 年代需求进一步增加，调研反过来促进学者的认识。1939 年拉德克利夫 - 布朗执掌的功能学派从伦敦经济学院移到牛津大学，田野工作从澳大利亚转到非洲，《非洲的政治制度》是标志性成果。^② 人类学为殖民政府提供长时期的咨询服务，有时效果并不理想。塞利格曼在苏丹工作期间，曾建议与努巴山区的“祈雨祭师”合作以利于殖民统治，但是其意见未被采纳。埃文思 - 普里查德曾表示，他在调研苏丹期间，殖民政府未向他征求过建议。^③ 由此看来，殖民政府的策略有两种：一种是在制定殖民计划时就将来可能出现的问题及时向学者咨询，另一种是出现问题后再向学者求助。

学科知识为殖民政府服务与学科建构相辅相成。这种关系经历基本认识、答疑解惑、解决问题、战略决策和理论概括等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了解和解释本土社会的构成要素，即本土制度赖以生存的阶层、统治集团、政治制度、宗教思想派别等，为殖民政府列出各种变量和现实问题。第二个阶段是分析问题的根源，牵涉对本土社会及各种构成要素的起源、历史和作用的分析。第三个阶段是对殖民统治遇到的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前两个阶段的工作时有重合，典型例子是关于阿散蒂的研究。^④ 在英国征服黄金海岸的过程中，对金凳子的信仰和崇拜是阿散蒂人对英帝国抗争的重要文化政治诱因，拉特雷的研究使英国避免了与该地区民众的冲突。^⑤ 《非洲概览》可谓将基本知识和答疑解惑结合的典型，既提供了有关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各种信息，也试图解释各种问题的原因，甚至提出解决问题的方向或相关因素。

① Sally Chilver, "The Secretaryship of the Colonial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A reminiscence," *Anthropological Forum*, Vol. 4, No. 2, 1977, pp. 239 - 248.

② 有关英国人类学功能学派，参见张海洋：《马林诺斯基与中国人类学——〈科学的文化理论〉译序》，载 [英] B. 马林诺斯基：《科学的文化理论》，黄建波等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24 页。《非洲的政治制度》的出版引起轰动，对非洲政治制度的教条看法开始盛行。

③ Evans - Pritchard, "Applied Anthropology," *Africa*, Vol. 16, 1946, p. 97.

④ 阿散蒂是西非地区的一个重要王国（有的称为帝国），曾与英国殖民侵略军进行多次战斗。Ivor Wilks, *Asant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Structure and Evolution of a Political Ord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有关其王权的形成，参见李安山：《阿散蒂王权的形成、演变及其特点》，载施治生、刘欣如主编：《古代王权与专制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61—185 页。

⑤ R. S. Rattray, *Ashanti*, pp. 287 - 293; P. Sarpong, *The Sacred Stools of the Akan*, Accra, 1971, pp. 5 - 8; K. O. Bonsu Kyeretwie, *Ashanti Hero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p. 8 - 13.

对于第三个阶段，海利勋爵的表述代表了一种批判态度。他承认甚至责备政府对人类学家在殖民统治中的价值缺乏认识，“可以这样说，对其价值的认识来得太晚了，尚未对研究工作者服务提出任何系统性需求。”他对那些决策者未能尽可能地利用人类学研究成果表示失望。“只有当人们认为其服务具有积极和建设性的价值时，才会对其服务产生需求。”^①他肯定了人类学家的研究价值并建议招募他们为政府服务，使其研究直接针对殖民统治的问题。当然，这种肯定充满实用主义的要求：只有帮助殖民政府解决问题，其价值才能得到肯定。

学术为殖民统治或国家利益服务还有一个更高的层面，即战略决策服务。牛津大学地理系主任麦金德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中提出的“心脏地带论”分析了地理环境与人类关系，他因此成为第一个以全球战略视角来分析世界政治力量的学者。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提出有关文明发展阶段的理论，从另一个角度提供了一种新的战略思维。当代学术界也不乏其例，罗斯托有关现代化阶段的理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约瑟夫·奈有关软实力的论点均是为国家战略服务的典型。

不容否认，一些人类学家主张区分学术研究和为殖民统治服务的实用价值。二战结束后，埃文思-普里查德于1945年11月29日在牛津大学人类学学会的一次讲座中向殖民地政府表明观点：让担任政府顾问或一般顾问的人类学家成为政府正式成员很重要。“只有能从内部了解官僚机构，可以查阅所有政府文件，并作为平等的代表在同一个会议桌上与各部门负责人会面，他才能就政府的法律、教育、经济和其他社会计划对土著人口的影响提出建议。……政府官员不能指望我们放弃自己的科学研究和教学去调查他们的实际问题，并就其政策提出建议。如果他们想得到帮助，必须在殖民地设立职位去吸引人。这样，科学工作就可以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继续进行。”^②很明显，埃文思-普里查德不满意殖民政府支配人类学家的权宜措施，明确提出人类学家只有在政府部门具有合法编制和职位，享有与政府官员同等的权利和收集资料的条件，才能根据需要进行研究，其成果才能对政策起到咨询作用。这一看法与海利勋爵的观点一致。《非洲的政治制度》具有宏观视角、反马林诺斯基学派应用研究的姿态以及不涉及殖民政府所面临迫切问题的立场。作为20世纪30年代有关间接统治问题辩论的结果，它也是对英国间接统治提出的咨询意见，至于是否采纳又当别论。^③

① Lord Hailey, "The Role of Anthropology in Colonial Development," pp. 11 - 16.

② Evans - Pritchard, "Applied Anthropology," *Africa*, Vol. 16, 1946, pp. 97 - 98.

③ 福蒂斯和埃文思-普里查德在导论中指出：“英属非洲总体上推行的是‘间接统治’（Indirect Rule）政策。我们想要揭示的是，如果本书讨论的非洲政治制度原则能够被人理解，从长远来看就是有利的。”[英] M. 福蒂斯、E. E. 埃文思-普里查德编：《非洲的政治制度》，刘真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4页。

历史、文化与文明：话语建构与解构

帝国主义瓜分非洲以后，殖民统治工具之一是意识形态。^①“话语建构”指殖民宗主国对“他者”历史文化的殖民化，“解构”即非殖民化。^②话语建构和解构是意识形态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多种话题。由于这一话语体系很宏大，本文仅能从历史、文化和文明三个议题着手，对话语建构和解构略作分析。

从近代欧洲资本主义体系崛起特别是 19 世纪殖民统治建立以来，对欧洲历史文化的高扬和对“他者”历史文化的贬低成为殖民主义的合法根据，种族主义成为殖民话语的一部分。^③最有意思的是西方对中国文化历史态度的转变。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著名学者莱布尼茨、伏尔泰、魁奈等均十分推崇中国文化。莱布尼茨表示：“谁人过去曾经想到，地球上还存在着这么一个民族，它比我们这个自以为在所有方面都教养有素的民族更加具有道德修养？自从我们认识中国人之后，便在他们身上发现了这点。如果说我们在手工艺技能上与之相比不分上下，而在思辨科学方面要略胜一筹的话，那么在实践哲学方面，即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方面，我们实在是相形见绌了。”^④当然，这种认识只是对个别学者而言，中国国门被西方打开后，它在欧洲人眼里从先进民族变为落后民族，从崇尚民主的民族变为喜好专制的民族。^⑤

欧洲人对非洲历史的认识似乎也经历了这一过程。到非洲探险的欧洲人以及对非洲早期文明有所认识的欧洲学者对非洲王国的秩序和强大印象深刻。荷兰探险者戴珀（O. Dapper）这样描述 17 世纪的贝宁王国（位于今尼日利亚）：“他们有自己的法律和组织完善的警察，他们与来做生意的荷兰人及其他外国人保持着

-
- ① 迈克尔·曼将社会权力分为四种：经济、意识形态、军事和政治权力。[英] 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一卷）：从开端到 1760 年的权力史》，刘北成、李少军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15 年版。
- ② 李安山：《论“非殖民化”：一个概念的缘起与演变》，《世界历史》1998 年第 4 期。
- ③ [英] 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 古典文明的亚非之根（第一卷）——编造古希腊：1785—1985》，郝田虎、程英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246—253 页。
- ④ [德] 夏瑞春编：《德国思想家论中国》，陈爱政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5 页。
- ⑤ 在欧洲，以前喝来自中国的茶是有身份的表现，但 1858 年讥讽华人的诗中出现了“谎茶”（lie-tea），被认为是假货。有关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参见 [法] 安田朴：《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耿昇译，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法] 维吉尔·毕诺：《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耿昇译，商务印书馆 2013 年版；白佐良、马西尼：《意大利与中国》，萧晓玲、白玉崑译，商务印书馆 2002 年版。

很好的关系，并对他们表示出极大的友善。”^① 首位考察尼日尔河的英国人帕克 (M. Park) 这样记录塞古：“河上无数小船，拥挤的人群，附近农村的耕作，这一切构成了一幅文明壮丽的景象。我万万没有料想到在非洲腹地会看到这样的情景。”^② 德国人巴斯 (H. Barth) 将卡诺与欧洲进行比较后认为：“卡诺应该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之一。”^③ 法国殖民考察队队长在参观了桑海帝国首府加奥遗址后感慨道：“在当时，桑海帝国不仅是非洲最强大的国家，而且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④ 帕麦尔 (H. R. Palmer) 认为 12 世纪博尔努王国的文明程度高于同期的一些欧洲王国，“博尔努国家从埃及和北非得到启示，虽然它对于周围的非洲各族人民无情而且残暴，但是从它的一些早期酋长国所达到的文明程度来看，比同时期的一些欧洲王国还要高一筹。”^⑤

然而，殖民统治需要否定对非洲王国的这些认识。殖民宗主国并不限于建立政治统治和经济剥削，它以傲视一切的态度将种族文化优越感带到殖民地，力图抹杀殖民地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用自己的意识形态取而代之，从而建立其文化霸权地位。西方学者对非洲历史的偏见及其建构表现为三个观点：非洲历史“空白论”、非洲文明“外来论”和殖民统治对非洲发展作出贡献。黑格尔从未去过非洲，却毫无根据地认为：“任何想研究人性最可怕表现的人都会在非洲找到例证。关于该大陆的最早报告告诉我们，它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历史。”^⑥ 黑格尔对非洲历史的无知影响颇大。1923 年英国历史学家牛顿提出：“非洲在欧洲人进入之前没有历史，因为历史是伴随着人类对书写技能的掌握而产生的。”^⑦ 1951 年英国历史学家伯厄姆指出：“非洲没有书面语言，因而不存在历史。”^⑧

① [英] J. D. 费奇：《西非简史》，于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193 页。1897 年，英国人洗劫了贝宁王国首府贝宁城，抢夺了 2500 件精美的早期铜雕艺术品。

② Basil Davidson, *Africa: History of a Continent*, London: Spring Books, 1972, p. 245.

③ [英] 巴兹尔·戴维逊：《古老非洲的再发现》，屠尔康、葛佶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3 年版，第 189—90 页。

④ [法] 埃德蒙·塞雷·德里维埃：《尼日尔史》，上海师范大学《尼日尔史》翻译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115 页。

⑤ W. E. B. DuBois, *The World and Africa: An Inquiry into the Part Which Africa Has Played in World History*, International Publisher, 1992, p. 213.

⑥ G. W. F. Hegel, *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World History*, translated by H. B. Nisbe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1822], p. 142. 他承认对非洲“几乎毫无所知”，但得出的结论正适合殖民主义的需要，因而被不断引用。[德]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6 年版，第 135—144 页。

⑦ A. P. Newton, “Africa and Historical Research,” *African Affairs*, Vol. 22, No. 88, July, 1923, p. 267.

⑧ Margery F. Perham, “The British Problem in Africa,” *Foreign Affairs*, Vol. 29, No. 4, 1951, p. 637.

1963 年牛津大学特雷沃尔 - 罗珀教授在广播讲座中认为,“将来可能会有非洲历史可以讲授,但是目前还没有,只有在非洲的欧洲人历史。其余是一片漆黑……而黑暗不是历史的题材。”^① 这些学者无疑都在重复黑格尔的观点。1966 年,史学家汤因比仍坚持认为:“由于地理环境的制约,非洲是文明渗透最晚的一个大陆,比其他地方晚了五千年。”^② 这种将文化传播视为文明产生之唯一方式的地理传播主义缺乏说服力,可以说是非洲历史“空白论”的翻版。

即使对古埃及文明也经历了从否认到不得不肯定的过程。^③ 随着撒哈拉以南非洲其他文明被发掘或发现,对非洲历史的解释由“空白论”转为“含米特理论”,即非洲历史是受含米特人(Hamite)影响的。“含米特人”的概念源自《圣经》,在 18 世纪以前等同于尼格罗人,殖民扩张需要使欧洲人逐渐将含米特人划归高加索人种。^④ 塞利格曼将非洲人划为两个白人种族(含米特人和闪米特人)和三个黑人种族(尼格罗人、科伊桑人和尼格利罗人),认为非洲文明是含米特人的文明,非洲历史是含米特各族的记录以及他们与两个较原始的非洲人群即尼格罗人和布须曼人相互影响的记录;含米特人是高加索人种,即与差不多所有的欧洲人同属于人类一个大支派。^⑤ 非洲史学家阿拉戈指出,塞利格曼将对非洲历史带有种族歧视的偏见推向高潮。^⑥ 英国史学家奥立弗认为,“埃及向马格里布和撒哈拉以南非洲提供了文明、学术、奢侈品和世俗权力的标准。”^⑦ 费奇在 1969 年出版的《西非简史》中对其 1955 年版的观点进行了修正,但仍坚持认为非洲神圣王权源于埃及和含米特人随后扩展至整个大陆。《现代乌干达的形成》一书的作者英厄姆也持同一观点。^⑧ 这种理论缺乏足够的史料证

-
- ① H. Trevor - Roper, “The Rise of Christian Europe,” *The Listener*, Vol. 70, No. 1809, 1963, p. 871.
 ② Arnold Toynbee, *Change and Habit: The Challenge of Our Tim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94 - 95.
 ③ [英] 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之根(第一卷)——编造古希腊:1785 - 1985》,郝田虎、程英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248—285 页。
 ④ 该理论的鼓吹者从未在含米特人特征上达成共识,他们或强调游牧为其职业,或突出其语言和宗教特征,或用肤色、身高、头盖骨或头发质地等体质特点来描述。E. F. Sanders, “The Hamitic Hypothesis: Its Origin and Function in Time Perspective,” *Th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Vol. 10, No. 4, 1969, pp. 521 - 523.
 ⑤ [英] 塞利格曼:《非洲的种族》,费孝通译,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69—114 页。
 ⑥ [尼日利亚] 埃比戈贝里·乔·阿拉戈:《非洲史学实践——非洲史学史》,郑晓霞、王勤、胡皎玮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90 页。
 ⑦ R. Oliver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 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 - 2.
 ⑧ [英] J. D. 费奇:《西非简史》,于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20—21 页; [英] 肯尼斯·英厄姆:《现代乌干达的形成》,钟丘译,商务印书馆 1973 年版,第 10—12 页。

据，这是史学研究的大忌。^①

夸大奴隶贸易和殖民主义的进步作用是另一种观点。杰默里等对 18 世纪西非卷入大西洋奴隶贸易的经济得失构建了一个模型，估计 18 世纪西非经济损失为 5460 万—8180 万英镑，收入为 7980 万英镑。^② 概言之，西非在奴隶贸易期间的收入竟然高于损失。然而，这一研究仅涉及奴隶人数统计，诸多方面如村庄、作物和环境、生育能力、恐惧情绪和内斗等诸多方面均未涉及，分析问题的角度、不同价值判断与人性道德判断等方面也不提。麦克菲认为，合法贸易和殖民统治为非洲注入活力，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英国资本进来，修建铁路，建造港口，清理水道，同时还介绍了新的文化，改进了旧的文化——它修建城镇道路，建立了市场；它引进了银行和方便的货币，开辟了矿场。更有甚者，英国政府为殖民地带来和平与安全，废除了奴隶制，其结果是贸易大发展。”^③ 盖恩认为，殖民主义给殖民地带来进步，对英帝国来说却是包袱，因此是利他的事业。^④ 敏特认为，殖民主义的进步体现在三方面：殖民地劳力和土地被利用、殖民地出口商品增长和商品经济刺激非洲人需求。因此，殖民统治建立起来的国际贸易关系帮助殖民地发展生产以增加商品交换，从而使殖民地进步。他提出，独立的欠发达国家应坚持与殖民时期相同的出口政策，即以出口原材料为主。^⑤ 汤因比在 1966 年仍将“西方人”进入非洲作为文明的标志。^⑥

殖民史学对非洲历史的否定和虚假建构引发非洲史学家的反感。尼日利亚史学家迪克指出：“非洲历史编纂学当前的问题，就是要揭穿这些‘神话’。”^⑦ 阿

-
- ① 对“含米特理论”批判最有力的为塞内加尔历史学家安塔·迪奥普，他对体质人类学、经典作家的记述、文化和语言等四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认为埃及和非洲同根同源，得出“古埃及文化属于非洲文化”的结论。见《古埃及人的起源》，载 [埃及] G·莫赫塔尔主编：《非洲通史（第二卷）：非洲古代文明》，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4 年版，第 20—61 页。
- ② H. A. Gemery & Jan S. Hogendorn (eds.), *The Uncommon Market: Essays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Academic Press, 1979, pp. 146 - 161.
- ③ Alan Mcphee, *The Economic Revolution in British West Africa*,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 Sons, 1926, p. 104
- ④ L. H. Gann and Peter Duignan, *Burden of Empire: An Appraisal of Western Colonialism in Africa South of the Sahara*, Frederick A. Praeger, 1968.
- ⑤ Hla Myint, “The ‘Classic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he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Economic Journal*, Vol. 68, June 1958, pp. 317 - 37. 直至 1980 年，他一直未改变观点，只是将“殖民统治”一词用“国际贸易”取而代之。Hla Myint, *The Economics of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5th edition, London: Hutchinson & Co. Ltd., 1980, pp. 32 - 43.
- ⑥ Arnold Toynbee, *Change and Habit: The Challenge of Our tim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 94 - 95.
- ⑦ 迪克：《非洲历史的研究》，佐海译，《亚非译丛》1963 年第 3 期，第 13 页。

拉戈认为，“必须创造出焕然一新的非洲史学。”^① 解构被篡改的历史，纠正殖民教育的历史偏见，非洲史学家任重道远。正是在对非洲历史重新研究的过程中，殖民话语得以解构，非洲历史观逐渐形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1—8 卷）的出版和《非洲通史》（9—11 卷）的完成是重写非洲历史的伟大工程。非殖民化已基本完成，而文化重建任重道远。在解构殖民史学的同时，应防止民族主义史学的偏见。^②

我们来看“文化”和“文明”这两个意思含糊却内涵丰富的概念。钱穆先生明言：“‘文明’‘文化’两辞，皆自西方译而来。”^③ 1949 年，克拉克洪在其经典著作《人类之镜》中列出文化的各种定义后，形象地将文化比喻成一幅地图或一个矩阵。^④ 根据统计，从人类学家泰勒的代表作《原始文化》1871 年出版至 1951 年，共出现 164 种有关文化的定义。^⑤ 克罗伯和克拉克洪认为，文化是具有整体性和历史性的行为系统，核心要素是由传统观念尤其是价值系统所构成。各个学科给文化的定义各异。历史学家斯宾格勒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是一种独特经历，即他人无法理解的艺术、哲学、数学体系和思维方式。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将文化定义为象征系统，由语言、婚姻、规则、经济关系、科学、艺术、宗教等组合而成，实为一种行为模式。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将文化等同于文明。文学批评家萨义德理解的文化具有两重意思：有别于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的相关活动，目的之一是娱乐；一种使人美好高尚的东西，即每个社会中被认为是最优秀的因素。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语言和宗教是文化或文明中最主要的两个因素。

库珀认为文化可以是“一种谈论集体身份的方式”“一个完整的精神整体”“集体的精神状态”“使生命有价值的东西”“特定民族的生活方式”“种族意识”“高等艺术”“传统观念和价值观”等。文化也可以定义为文明，因为它体现了民族的天赋，体现了任何社会遗传因素，或是“历史传递的意义模式”“对

-
- ① [尼日利亚] 埃比戈贝里·乔·阿拉戈：《非洲史学实践——非洲史学史》，第 112 页。
 ② 李安山：《非洲民族主义史学流派及其贡献》，《世界历史》2020 年第 1 期；李安山：《非洲现代史》（下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89—192 页。
 ③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 1994 年版，弁言，第 1 页。据推测，“文化”一词最早由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前 106 年—前 43 年）使用，18 世纪中叶才开始流行。“文明”一词于 1756 年出现。Fernand Braudel, *On Histo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p. 180.
 ④ Clyde Kluckhohn, *Mirror for Man: The Relation of Anthropology to Modern Life*, Routledge, 2018 [1949], pp. 28, 32.
 ⑤ Alfred Louis Kroeber and Clyde Kluckhohn, *Culture: 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 Papers of the Peabody Museum of American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 Vol. 47, No. 1, Harvard University, 1952.

于通过符号获得和传播的行为”“制度符号和意义”“一套符号装置”等。^① 史威德认为，“文化是各群体特定的真、善、美和有效率的概念。要成为‘文化’的成分，这些真、善、美、有效率的概念必须是社会继承而来的和通用的；它们还必须是不同生活方式的构成因素。”^② 文化的定义随着时代发展和新生事物的出现不断更新。格尔茨指出，人类学内部有关文化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争论无休止。^③ 历史学家钱穆认为，文化不属于个人，属于群体；文化不是某方面，是生活之总和；文化非一时性，有历史维度；文化承载着国家或民族史。“文化也就是此国家此民族的生命。如果一个国家民族没有了文化，那就等于没有了生命。……故我们说文化，并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在这平面的大的空间，各方面各种样的生活，再经历过时间的绵延性，那就是民族整个的生命，也就是那个民族的文化。”^④ 文化具有集体性、总体性、延时性和生命力。

文明概念的源起和传播与世界历史特别是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密切相关。含有现代意义的“文明”（la civilisation）概念源于法国，但学界对其诞生地和时间仍存在误解。^⑤ 德国学派认为文明与文化之间有明显区别，前者包括技巧、技术和物质因素，后者包括价值观和理念及社会更高级的思想艺术和道德品质。^⑥ 这种观点被殖民主义者强化，世界民族被分为“文明”和“野蛮”两类。欧洲民族成为“文明的”和“开化的”，所有他者是“野蛮的”和“未开化的”。这种对文明的区分实则源于我族中心主义。姆丁贝认为，我族中心主义有两种表现形

① Adam Kuper, *Culture: The Anthropologist's Accoun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② Richard A. Shweder, "Moral Maps, 'First World' Conceits, and the New Evangelists," in Lawrence E. Harrison and Samuel P. Huntington (eds.), *Culture Matters, How Values Shape Human Progress*, Basic Books, 2000, p. 163.

③ [美] 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13页。

④ 钱穆：《国史新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46—347页。

⑤ 以下三种观点有误。“据雷蒙·威廉斯研究，civilization（文明）一词早先出现在17世纪初期的英文中，最迟至1772年。它所包含的人类物质和精神生活两方面的社会进化、发展成就等现代含义已逐渐趋于稳定。”黄兴涛：《晚清民初现代“文明”和“文化”概念的形成及其历史实践》，《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6期，第2页。作者对雷蒙·威廉斯关于“civilization”一词起源的英文理解有误（详见后文）。新加坡华人学者王赓武认为：“‘文明’一词最早出现在17世纪的西欧地区，主要是指人类在技术发展与革新的推动下，从蒙昧野蛮过渡到文明开化的过程。”《王赓武：文明无国界：以史为镜》，《北京论坛（2004—2015）主旨报告与特邀报告集》，北京大学北京论坛办公室，2016年，第323页；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香港大学前校长王赓武：以史为镜，文明无界》，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网，2015年8月31日，<https://www.oir.pku.edu.cn/info/1038/2841.htm>，访问日期：2025年1月3日。“‘文明’概念最早出现于1860年代法国老米拉波侯爵的著作。”高力克、顾霞：《“文明”概念的流变》，《浙江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第11—20页。

⑥ Alfred Louis Kroeber and Clyde Kluckhohn, *Culture: 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 pp. 15 - 29.

式：认识论亲缘关系（epistemological filiation）和意识形态联系（ideological connection）。认识论亲缘关系是一种知识氛围，它赋予人类学话语的地位、学科的意义以及作为一门科学在人类经验领域的可信度；意识形态联系是指不同个体的智力和行为态度。“这种态度既是一种结果，也是学者的意识投射、他那个时代的科学模型和他那个社会的文化和社会规范之间复杂联系的一种表现。……我可以这样说，认识论亲缘关系保证并维持了人类学作为一个知识体系和一门正在发展的科学；文化种族中心主义解释了社会科学学科在历史 and 实践中意识形态的变化和斗争。”^① 殖民时期的人类学将这两种表现形式完美结合，使其在权力和知识的话语中占据强有力的地位——一种建立在生理特征上的意识形态的表达，以利于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强行扩张。这种偏见成为征服他者或对他者实施压迫和统治的借口，这就是姆丁贝所指的第二种认识——意识形态联系。这种认识的表现形式是近代以来应殖民统治而生的种族主义意识。

对文明的另一种理解是将其看作一个文化实体，认为文明和文化构成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亨廷顿认为，“文明和文化都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文明是放大的文化”“文明是一个最广泛的文化实体”。^②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将文明作为历史的最小研究单位，相当于文化体，于是有埃及文明、西方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等 21 种“同类文明”。^③ 然而，汤因比未给文明下一个准确定义。^④ 他从未提及撒哈拉以南非洲文明，而是认为西方人为非洲带来文明。^⑤ 此观点直到 1972 年才改变。^⑥ 布鲁戴尔认为，文明是文化特征和文化现象的聚焦体。^⑦ 钱穆认为：“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故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积累而产生。”“当知产生此项机械者是文化，应用此项机械而造成人生的形形色色是文明。文化可以产出文明来，文明却不一定能产生文化来。”^⑧ 钱穆分析了两者的关系及特点。文明产生于文化，是具有历史维度的价值体系和社会生活的总和，既是人类共同

① V. Y. Mudimbe, *The Invention of Africa: Gnosis, Philosophy, and the Order of Knowledge*, 1988, p. 19.

② [美]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4—26 页。

③ [英] 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上、下卷），郭小凌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10 年版。

④ Fernand Braudel, *On History*, pp. 189 - 197.

⑤ Arnold Toynbee, *Change and Habit: The Challenge of Our Time*, pp. 94 - 95.

⑥ “我们现在知道，在热带非洲，农业和冶金方面有着可与西欧比肩的历史。” Arnold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p. 13.

⑦ Fernand Braudel, *On History*, p. 177.

⑧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 1994 年版，弁言，第 1 页。

体历史发展的结果，又从各方面影响人类生活。

从人类学家创始人的表述看，人类学可定义为表述和研究“他者”物质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学科。^① 皇家人类学学会主席布劳恩霍尔茨（Hermann Justus Braunholtz）提道：“英国人类学家研究英国殖民地居民的自然倾向。”^② 法国人类学家奥格指出：“人类学既没有解决也没有排除他者地位的问题，这既是人类学的痛苦，也是其正当性所在。”^③ 这种“他者”是指有别于欧洲或西方“文明世界”的那些“野蛮的”“蒙昧的”或“原始的”文化，用较中性的表达方式即“自然的”“传统的”国家，或“无国家的社会”（stateless societies），或者是“没有历史的”的民族。人类学家费边的《时间与他者》专门研究“人类学是如何定义或建构其对象——他者的”。这是对人类学家自己处于“此时此地”而将其研究对象“他者”置于“彼时彼地”这种观念的批判。人类学研究处于另一种时间的另一群人，将自身与研究对象置于不同时期，“这种‘僵化的关系’是一种丑闻”。他指出，“人类学的‘他者’终究是与我们同时代的人。”人类学在特定群体或社会中通过研究获取知识。“作为研究和被研究的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人类学和目标之间的关系不可避免地是政治性的；知识的产生是一个群体间、阶级间以及国家间关系的公共论坛。”^④ 这种评论既是人类学家对学科的反思，也改变了人类学家与其研究对象的关系，颇具价值。

从西方流行的学术谱系看，西方与“他者”形成了一个明显的对应关系：西方世界是“已进化的、基督教的、现代的、先进的、文明的、进步的、自由的、民主的”社会，“他者”世界是“未进化的、异教的、传统的、落后的、野蛮的、停滞的、独裁的、专制的”社会。两者空间上的地理位置明确，一方是“西方社会”，另一方是“非西方社会”，包括亚、非、拉美、太平洋岛屿等地区；时间上处于完全不同的时代，在性质上属于完全不同的文化。一位学者说过：任何社会人文学科如果远离人性或人类，人类也只能远离这门学科。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人类学曾经试图不是从空间上而是从时间上远离其研究对象。这种

-
- ① 除泰勒（Edward Taylor, 1832 - 1917）、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 1854 - 1941）和博厄斯（Franz Boas, 1858 - 1942）等“现代人类学之父”的表述之外，社会学创始人之一的涂尔干（Emile Durkheim）认为：“人类学只研究野蛮和蒙昧社会。” E. Durkheim, *The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2 [1907], p. 209.
- ② H. J. Braunholtz, “Anthropology in Theory and Practic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Vol. 73, No. 1 - 2, 1943, p. 8.
- ③ Marc Augé, *The Anthropological Circle: Symbol, Function,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14.
- ④ Johannes Fabian, *Time and the Other: How Anthropology Makes its Objec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143 - 165.

对他者的想象和概念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早期的教会人类学家对“他者”的想象，到殖民前期探险家对“他者”的夸张描述，再到殖民统治时期对殖民地“他者”的调研。在英帝国扩张的维多利亚时期，盛行一种国内和殖民地领域“他者”之间的经验和意识形态表达，这为人类学的“他者”观念提供了恰当的社会氛围。^①“他者”在整个社会和人文科学话语中仅作为“对象”而存在，^②这种被动的角色使“他者”成为欧洲殖民体系的被统治者这一现象不仅合理而且合法。

法国社会思想家戈比诺（J. Arthur Comte de Gobineau, 1816 - 1882）的《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是早期种族主义的代表作。“黑种人是最低等的，处于梯级的底部。其基本形式所具有的动物特征从胚胎形成的那一刻就决定了它的命运。”“荣誉这个词，像包含荣誉的文明概念一样，黄种人和黑种人都是不知道的。”^③有关“他者”的形象也出现在被标榜为“人道主义者”的法国哲学家勒南（1823—1892）对黑人和华人的描述中。他在《理智和道德的改造》中明确表述了欧洲人统治其他民族的意愿：“主宰人类是我们的天职……上天创造出一种劳作的种族——华人，他们具有绝妙的劳动技巧，而几乎没有什么荣誉感……上天创造出土地的耕作者——黑人，待他们以慈善与人道，一切就会适得其反。上天创造出主人和军人的种族——欧洲人，若令这种高贵的种族降低身份像黑人和华人一样从事奴隶劳动，他们就会造反。”^④勒南希望欧洲人永远主宰世界。这种对“他者”的歧视根深蒂固，并以“科学进化论”和“哲学的理性主义”的名义得以合理化。

然而，“他者”并非只属于西方以外的世界，而是在不同时空环境有不同主体，那些欧洲人类学家在特定条件下也成为非洲民众中的“他者”。1928年，一位欧洲人类学家在马里图冈考察有关割礼仪式用作祭品的母鸡，法国军官要求当地酋长尽量满足这位学者的要求。酋长将全村人召集起来，会议由负责割礼仪式的掌刀人主持。当地习俗规定，想知道割礼过程及其训诫的人必须行割礼并像行过割礼的人一样生活。尽管村酋长和掌刀人受法军武力所迫，但他们的智慧不可小视。掌刀人说：“我们把他放进稻草里，把他应付过去，而一点声色不露。”“放进稻草里”或带上眼罩，比喻不将真相告知，或编造故事欺骗。这种方法是一种本土发明，当殖民学者或其他人研究问题却不愿按当地规定行事时，人们

① George W. Stocking, Jr., *Victorian Anthropolog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7, pp. 186 - 237.

② V. Y. Mudimbe, *The Invention of Africa: Gnosis, Philosophy, and the Order of Knowledge*, p. 34.

③ [英] 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之根（第1部）——编造古希腊：1785—1985》，第249页。

④ Ernest Renan, *La Réforme intellectuelle et morale*, Paris: Michel Lévy frères, 1875, pp. 93 - 94.

就采用此法。“许多人类学家都不知不觉地成为这种策略的牺牲品——还有许多人类学家在没有身体力行因而并不真正了解时，却以为自己认识透彻。”^①看来，须认真辨识欧洲人类学家的成果，那些供殖民统治参考的有关殖民地知识的可靠性存疑。^②以西方中心论为基轴的文明概念充满偏见。布鲁戴尔指出：“西方文明已经主宰了这个星球，它已经成为一种‘无国界’的文明，挥霍着它的才能——无论好坏，以及局限与冲突。”^③非洲著名哲学家姆丁贝的做法更直接，在他的著作中，“文明”与“基督教”等同。^④

文明用特定标准来衡量极为片面。人类发展受环境影响，不能用同一物质标准来衡量文明成果。近代以来，欧美列强为了使殖民统治合理化，文明概念被政治化，世界民族被人为地分为“文明的”（欧洲人）和“野蛮的”（他者）。然而，欧洲文明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尼日利亚历史学家伊尼科里的研究表明，非洲人对英国工业革命的贡献巨大：“毫无疑问，大西洋商业的发展最终是英国成功完成工业化进程的核心因素。同样，毫无疑问，非洲人及其后裔的劳动使这一时期大西洋商业的发展成为可能。因此，我们有理由得出结论，非洲人对英国工业革命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⑤在英国工业革命的过程中，非洲人的作用是什么？文明的还是野蛮的？喀麦隆学者姆旺指出：“今天，西方同意我们的观点，即通往真理有无数条道路，而不只是亚里士多德—托马斯的逻辑学或黑格尔的辩证法。然而，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本身必须非殖民化。”^⑥

结 语

综上所述，殖民统治与学术之间的互动表现在各个方面，学校建设、学术学科及话语体系的建构无一不与殖民利益相关。马提尼克诗人、著名黑人政治家艾米·塞萨尔指出：“一种被证明无法解决它所造成的问题的文明是颓废的文明。”

-
- ① [马里] A. 哈姆帕特·巴：《逼真的传说》，载 [上沃尔特] J. 基-泽博主编：《非洲通史（第一卷）：编史方法及非洲史前史》，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4 年版，第 130—131 页。
 - ② Clyde Kluckhohn, *Mirror for Man: The Relation of Anthropology to Modern Life*, Routledge, 2018 [1949], p. 22.
 - ③ Fernand Braudel, *On History*, p. 204.
 - ④ V. Y. Mudimbe, *The Invention of Africa: Gnosis, Philosophy, and the Order of Knowledge*, pp. 20, 49, 51, 53, 234.
 - ⑤ Joseph E. Inikori, *Africans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A Study i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486.
 - ⑥ E. Mveng, “Récents développements de la théologie africaine”, *Bulletin of African Theology*, Vol. 5, No. 9, 1983, p. 141.

一种选择对其最关键问题视而不见的文明是病态的文明。一种利用其原则进行欺骗和欺诈的文明是垂死的文明。事实上，由两个世纪的资产阶级统治形成的所谓欧洲文明——‘西方’文明无法解决其存在所导致的两大问题：无产阶级问题和殖民地问题。欧洲无法在‘理性’或‘良知’面前为自己辩护；而且，它越来越置身于伪善之中。”^① 有鉴于此，有必要对殖民主义在学术方面的影响进行清算。实际上，非洲学者早已开始在人类学领域进行非殖民化，这些成果体现在肯尼亚的乔莫·肯雅塔、尼日利亚的纳姆迪·阿齐克韦、加纳的科菲·布西亚、南非的阿齐·玛费杰、乌干达的奥考特·庇泰克等人的研究成果中。^② 政治主权对非洲国家而言非常重要，包括学术建构在内的文化主权在今日非洲显得更为重要，而维护文化主权这一重要任务应该由非洲人自己来完成。

(责任编辑：吴传华)

-
- ① Aimé Césaire, *Discourse on Colonialism*, translated by J. Pinkha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1955), p. 1.
- ② Jomo Kenyatta, *Facing Mount Kenya: The Traditional Life of the Gikuyu*, Martin Secker & Warburg Ltd., 1938; Nnamdi Azikiwe, *Renascent Africa*, London: Frank Cass and Company Limited, 1968[1937]; Nnamdi Azikiwe, *Zik: A Selection from the Speeches of Nnamdi Azikiw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1; K. A. Busia, *The Position of the Chief in the Modern Political System of Ashant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Archie Mafeje, *The Theory and Ethnography of African Social Formations: The Case of the Interlacustrine Kingdoms*, Dakar: CODESRIA, 1991; Archie Mafeje, *Anthropology in Post-Independence Africa: End of an Era and the Problem of Self-redefinition*, Nairobi: Heinrich Böll Foundation, 2001; Okot p' Bitek, *Decolonizing African Religions: A Short History of African Religions in Western Scholarship*, Diasporic African Press, 2011. 景军梳理了非洲学者对人类学的贡献，特别是当代非洲人类学家的成果。景军：《人类学思想的他者建树》，载景军、高良敏主编：《南部理论：人文社科思想的他者建树》，第191—212页。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olonial Rule and Academic Construction

——A Case Study of British Colonial Rule in Africa

Li Anshan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British colonial rule in Africa as a case study, systematically analyzing the complex interactions between colonial power and academic construction through three key dimensions: school, discipline, and discourse. In terms of school,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established an education system to cultivate local elites serving its rule. This system, oriented toward practicality and cultural assimilation, reinforced the infiltration of colonial ideology. In terms of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takes British anthropology as an example to reveal how the discipline provides knowledge tools for indirect rule through field research and theoretical production. In terms of discourse, this article critiques the colonizers'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of African history,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exposing the underlying racism and Western – centrism logics. The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school, discipline and discourse constructions are all closely related to colonial interests. Colonial rule “otherized” Africa through academic mechanisms, shaping a discipline system that served imperial interests and dissolving the subjectivity of African indigenous culture. In the post colonial era, Africa not only needs to consolidate political sovereignty, but also needs to maintain cultural sovereignty, including reconstructing academic discourse, deconstructing colonial heritage, and achieving decolonization of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through independent research by African scholars.

Keywords: colonial rule, academic construction, Western – centrism, cultural sovereignty, decolonization

Author: Li Anshan, Professor of Peking University; Ph. D. in History,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ident of Chinese Society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Vice President of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mmittee for the 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 Volume IX–XI, UNESCO; Foreign Associate Member of the Royal Academy of Morocco (Beijing 100871).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Combating Transnational Organised Crime in Africa

—— Law Enforcement and Security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Fu Qinwen

Abstract: After World War II, Africa became a complex breeding ground for